

# 创新发展为经济社会注入强劲动力

□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创新发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提出了一系列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创新发展思想，构建了中国特色创新发展理论和制度体系，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从科技创新到全面创新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诸因素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也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性、第一性的因素。他十分重视科学力量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作用。马克思指出，科学是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的智力，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

我党历来重视科技创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1963年又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名言，大家都耳熟能详。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提到了“创新问题”，尔后，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创新，也正因为如此，才实现了我国经济的高速跨越式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是把创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创新的竞争。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科技创新提升和深化为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在内的全面创新，丰富和发展了创新理论。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是各类创新活动的思想灵魂和方法来源。近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是不断理论创新的实践写照。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开放理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发展理念等，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制度创新是持续创

新的保障，是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的关键。制度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等。文化也是生产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根基，是各类创新的精神动力。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需要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而创新文化需要文化创新的推动。科技创新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在全面创新中起引领作用。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 深刻揭示创新发展的实质要求：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

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是创新的应有之义和核心。科技创新及其成果决不能仅仅落在经费上、填在表格里、发表在杂志上，而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推动力，转化为人民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多年来，我国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着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化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完善创新生态系统，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所谓“双轮驱动”，就是要让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相互协调、持续发力；就是要统筹推进科技、经济和政府治理等方面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活力，推动人财物各种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变“要我创新”为“我要创新”，使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

## 构建创新发展的制度框架：从战略部署、制度安排到实践落实

创新发展的制度设计日臻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了部署，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入手，对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国家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作出了战略性制度设计。随后出台的《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是具体落实方案，问题准、政策实。2015年3月发布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从战略思路和目标、环境营造、市场导向、金融支持、人才机制、政策统筹等方面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体制机制改革作出了详尽安排。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制约我国创新发展的顽疾，针对此，2015年8月修订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颁布，随后2016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实施该法的若干规定，最大的亮点是，放大了国家设立的机构转化科技成果的权利，加大了对相关人员的奖励，鼓励科研人员离职创业。针对创新发展的人才制约，2016年3月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向用人单位放权、为人才松绑，对人才管理、培养、评价、流动和创新创业激励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提出了创新要求。2016年5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发布，明确了我国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目标，详尽规划了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方向、目标和工作重点。2016年7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改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政策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完善了科研经费管理，给予科研项目承担单位更多的自主权，减轻科技人员经费报销负担，腾出更多的时间专心做科研。2016年11月发布的《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充分发挥收入分配对创新发展的激励导向作用。

体制机制创新成效显著。多项改革举措正在深入实施。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及6个专项小组成立，提高了改革的决策效率，解决了长期困扰改革的政出多门、部门扯皮、互相掣肘的问题；负面清单、后置审批以及便捷工商登记等一系列便利措施的推出为市场资源的流动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创新创业风起云涌，涌现出了一大批年轻的极客、创客乃至企业家。互联网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模式广泛渗透。按照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我国已经跻身世界创新

25强。科技与经济融合加快，2016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了56.2%，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5%和10.8%，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5、4.8个百分点，创新发展成效显著。

基础研究不断加强，为创新发展提供原动力。基础研究是创新之源，是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基础研究领域每次取得的重大进步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近5年来，我国投入基础研究的经费年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2016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中基础研究的占比达到了51%。当前我国国际论文发表数量稳居世界第二，被引用次数升至第三位。基础研究领域一批重点项目取得重大突破，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基础研究的国际影响力。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大科学装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暗物质探测卫星“悟空”成功升空。国家在重大领域正在组建一批综合性的国家实验室，将进一步优化国家科研基地布局，加强基地和平台建设，提高基础研究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凸显。当前我国研发投入的77%左右是企业投入的，人才不断向企业集聚，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载人航天、蛟龙号深潜器、特高压输电、第三代核电、大型客机C919、高速列车等，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但地位仍不够牢固，进一步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政策措施正在落实，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倒逼企业创新反映稀缺性和环境影响的资源价格机制和税收体系正在形成；努力消除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的公平的市场准入规则正在落实，开放统一的市场环境正在形成；以研发投入税前抵扣为代表的普惠性的创新支持政策体系，为各类创新主体注入了催化剂；将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益纳入了考核体系的国有企业业绩考核体系以及容错机制的构建，极大地加快了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步伐；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和依法保护产权给民营企业家吃了“定心丸”，激发了他们的创新创业活力和积极性，民营企业已经成为驱动创新发展的生力军。

创新人才潜能不断释放。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调动人才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向用人单位放权，为人才松绑，让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尽其所长。各地出台了对教学科研人员出国访问经费单独统计，国有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发生的人才专项投入视为当期利润，高层次人才的收入分配、横向课题收入、科技成果转化奖励、科研经费绩效奖励等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量，把科技成果转化权、收益权下放给项目承担单位等一系列具体政策，最大限度地释放人才潜能。

(执笔人：陈宇宇)



# 把深化金融改革作为根本动力

□ 本报评论员 杨英杰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有两次十分明显的发展机遇，一次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一次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人口红利、制度红利以及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这两次经济大跃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实体经济的扩张。时至今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及其自身改革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仍有很大的潜力。如果说经济新常态下实体经济面临诸多难题，那么，这正是以金融改革的深化释放新的改革红利之最佳时机，也是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深化金融改革作为根本动力的意义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改革有序稳步前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不断完善、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序推进、民营银行试水、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业双向开放取得新进展，金融改革实实在在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大鹏之功，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体与金融如车之双毂、鸟之两翼，不可偏废。长期以来，关于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最富有挑战和最吸引人的热门话题之一。总体来看，大多数学者认为，金融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一定范围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一旦超出一定的度，就会伤害实体经济乃至诱发金融危机。

最近，英国密德萨斯大学两位学者利用1970—2010年间101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数据研究了金融发展、实体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依赖于信贷是否流向实体经济部门。如果信贷规模膨胀速度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那么，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因此，金融的改革与发展一定要紧紧围绕实体经济来进行。

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是深化金融改革的最主要任务。金融要始终向实体经济聚力，助力做实做优做强实体经济，金融改革要围绕如何更便捷更高效服务实体经济来深化。深化金融改革，要为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作出努力和贡献。尤其是去杠杆，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推进资产重组和债务管理，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更多发挥国家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作用。优化不良资产交易平台，扩围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设立快速清算通道，提高资产处置效率。

深化金融改革，要从强化外部监管和内部管理两个方面入手。所谓外部监管，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增强金融监管协调的权威性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金融体系和地方经济发展具有盘根错节的关系，金融风险具有区域性和系统性特征，要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所谓内部管理，就是要进一步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优化股权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风险内控机制建设，加强外部市场约束。

扩大金融对外开放，也是金融改革的应有之义。要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为我所用，在引进金融资源的同时，学习国际先进金融管理技术，提升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和水平。坚持自主、有序、平等、安全的方针，稳步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加快建立完善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有利于增强金融有序竞争、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机制。

我国金融改革工作繁重艰巨，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扎实抓好金融系统党的建设，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不断提升各级领导干部金融工作能力，为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创造优良金融生态环境，以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 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底气何来

□ 张 城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把文化自信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重大战略定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建设进程中的理论自觉。为更好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强调，要从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切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因此，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就是我们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更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时代要求。

## 深厚的文化历史传统

孕育于黄河之滨的中华民族，历经上下五千年，创造了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历经地域间的频繁流动，民族间的相互交往，文化间的彼

此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造就了傲立于世的灿烂文明，逐渐塑造了具有高度文化认同和极富生命力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梁漱溟即指出中国有极强的文化个性：独自创生非从它受，自成体系与它者差异甚大，自古及今绵延独存，同化能力极强，影响力既远且大，具有高度适应性及调和性。

中华民族素来对自身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直至近代遭遇了西洋坚船利炮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后，国人的文化自信才受到极大损伤。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企图通过解构民族历史，颠覆文化传统，否认革命正当性，诋毁国家发展成就，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对此，我们不必惊慌失措，只要厘清其来龙去脉，便能对症下药，逐一驳斥，以正视听。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既有其传统，又有其根本。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便是自绝民族精神命脉。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为治国理政积累了丰厚资源：这既为破解时代难题贡献了有益经验，又为化解社会矛盾提供了历史镜鉴。中华文明数千绵延不绝，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对历史文化传统有深入了解，对古人治国理政智慧进行总结。因此，对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对仍有借鉴价值的传统加以改造，赋予其时代内涵，激活其生命力；要

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我们必须珍视承继这份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民族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早日实现从文明大国到文化强国的历史转变。

## 高度的文化使命自觉

伴随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不断加深，文化全球化问题日益凸显，各主要文明逐渐被纳入世界文化体系之中。全球化潮流发端于西方，其背后必然带着极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立场。在参与全球化进程时，既要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又要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以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来建构属于自身的现代文化。文化全球化并非西化，更非美国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文化的世界交往应表征文化的民族性、差异性、多元性，并应把多元主义视为文化全球性的构成规则。

经历近40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必然会产生复兴本土文化的强烈要求。由此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中国的国家形象不应仅是“政治中国”，抑或“经济中国”，而更应该以文化为本位，展现“文化中国”的国家形象。的确，历史上的中国一向以文明国家展示于世，是名副其实的以华夏为中心、以

天下为情怀的文明礼仪之邦，自古及今都以文化立国。中华民族最突出的优势与形象应是文化，一代代宿学硕儒开创了中国的文脉，这既具有当代价值，也具有世界意义。

## 鲜明的文化价值立场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从国际关系角度提出了“软实力”概念，力图证明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文化是一种重要力量。的确，具有高度认同的文化传统，能使民族团结、国家凝聚、社会和谐，进而大力提升国家形象与影响力。

人民性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立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文化的终极关怀最终体现在为民谋福。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很好地继承了中华文化上数千年“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价值观念，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开放性是中国文化的鲜明价值特点。中华文明之所以经久不息、绵延长存，就在于其有海纳百川的文化胸襟，有兼收并蓄的开放传统。（下转7版）